

圆桌谈

主持人：

马兵

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

嘉宾：

魏新

全国政协委员、文化学者

吉小吉

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作家协会主席、诗人

乔洪涛

山东省青年作家协会副主席、青年小说家

『县域文学』如何突围？

当下的县城和基层乡镇，是生机勃勃的文学现场。在这里，活跃着一大批基层的写作者。他们的文学经验，他们所参与的文学生产和传播，是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县域文学，因此备受关注。本次“圆桌谈”邀请了3位有着县城生活经历并在县城书写上颇有经验的写作者，共同讨论县域文学的价值与困境。

魏新以二十余年的创作经历，坦言县城经验已内化为自己的写作基因，那份真实而普通的生活经验，反而连接了众多拥有相似记忆的读者。乔洪涛则强调县域是文学资源的“富矿”，但许多写作者受限于视野与笔力，难以将生活沉淀为有力的作品。吉小吉谈到基层写作者经常面临生活压力与文学视野的双重局限，提出县城写作者要“回到文学本身”，立足地方特质才是突围的正途。3位写作者不约而同地指向一个核心问题：在县域这个充满烟火气又常被忽视的舞台上，写作者如何真正扎根，让脚下的土地成为通往更广阔文学世界的起点？

——主持人



我和我写的县城

□魏新

在我所有的文字中，“县城”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。从2001年发表第一篇小说《花朵般的爱情》，到2006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《动物学》，再到最近这本散文集《我的家乡在“宇宙中心”》，恍恍惚惚写了二十多年。人已年近百岁，竟然还在写县城，不知道是该自信，抑或惶恐。

我在鲁西南一个县城出生、长大，在那里生活了十八年。那是我人生最难忘的十八年，至今我还经常梦见小时候住过的院子。香椿高耸，薄荷匍匐，满院的月季和菊花，我在追那只下蛋的老母鸡，绕着院子一圈又一圈，直到它跑不动了，卧倒在地，我把它抱起来……这一切如今只能在我的梦里存在。那时，我还自己画过县城的地图。就那么几条主路，连接了几十条小路，还有几条隐蔽的小道在水坑边，平常可以走，一下雨就消失在了水里。那些路现在都变得平整而宽阔，名字也都改得大气磅礴：泰山路、黄山路、五台山路、昆仑山路、闽江路、珠江路、赣江路、钱塘江路……我每次回去，都会迷路。

我有时会怀疑在县城的十八年，本身就是一场梦。我用了很长时间，想把这个梦描述出来，即便是碎片化的。虽然写写就醒了，但半梦半醒之间，我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写下去。世事一场大梦，县城几度秋凉。

《动物学》出版后，曾得到一些好评。那是我第一次直接把“县城”列为其中的章节，小说一半的篇幅都发生在县城里。接着，我写了《青春史》，以县城为背景写青春的荒谬和残酷。我还试图将长诗《四兄弟》写得有点重金属，也有点朋克。这组诗以县城四兄弟的命运为主线，写了县城在巨变中的泥沙俱下。那是我认为是自己写得最好的诗，也是让我停笔的一组诗——因为我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再写出这样的诗。

后来我的创作以历史文学为主，也有话剧，以及好几年央视春晚的小品。工作越来越忙，日子越来越快，本以为离开县城那么多年，不会再写那里了，但依然放不下。偶尔有空闲时间，我就写一些有关县城风物的闲笔，没想到有了更多的读者。他们大多和我一样来自县城，以“小镇做题家”或打工人的身份到了大城市，不论混得如何，内心深处都有一种县城情结，割舍不下。我写的是我的县城，其实是所有人的县城，是所有拥有“县城经验”的人的故乡。

我和他们一样，至今还活在“县城经验”中。AI技术的发展，让我想起小时候第一次走进电子游戏厅，发现屏幕里的人竟能被操纵杆操纵时的巨大震撼。看人工智能机器人跳舞的热闹，和那时在街上看耍猴差不多。直播带货的网红，说话语气则酷似那时街边摆摊卖鞋拿着喇叭吆喝的邻居。县城是最小的城市，又是最像城市的农村。它如此光怪陆离，有各种变形的的新鲜事物、夸张的时尚潮流，人们努力让自己变得潇洒、幽默、漂亮，却似乎总有一点点过头或缺欠，反而显得笨拙、滑稽、稚气。

县城人的生存智慧，我领略得远远不够。县城人的弱点，我也难以克服。我坐不惯城市的公交地铁，不会开车，只有骑车时才觉得身心俱悦。我逛不了城市的大商场和超市，总是找不到电梯和出口，只有在小店的柜台前结账才觉得踏实。我也住不惯高楼林立的城市新区，在老城区古旧的街巷里穿梭，才感到舒适自然。我从来没有方向感，因为在县城根本不需要，通过建筑物能很容易记住，但出了县城，我就再也不知道东西南北。

县城的文化，也深入我的骨髓。我那个县城是戏曲之乡，我在《我的家乡在“宇宙中心”》中写过——

这里的人被戏深刻影响。相当漫长的一个时期，人们所受的教育，都来自一个又一个或大或小的舞台。戏中的服装和舞美是人们的艺术启蒙；武生们连串的跟斗是人们的体育启蒙；或苍凉浑厚，或清脆婉转的唱腔是人们的音乐启蒙；通俗易懂、活泼生动的戏词是人们的语文启蒙。在戏里，这里的人学得率性幽默，“嘴巴一吸能拴住个驴”。在戏里，这里的人学得江湖义气：“谁要是和我对脾气，割我的肉吃我都不觉痛。”在戏里，这里的人学得家国情怀，明知道“争来的江山他赵家坐，哪一阵不伤俺杨家兵”，大敌当前却挺身而出：“我不领兵谁领兵？”

这几年，那个县城又成了“宇宙中心”，因为汉服和出口的棺材而天下闻名。我曾经画的那张地图早已过时，植入大脑的导航也有三十年未曾更新。把它们和如今的县城比时，我一次次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。我想自己还会一直写下去，无论什么体裁、什么形式、什么风格、什么内容……

县域生活是一片写作的富矿

□乔洪涛

空间与题材历来不是衡量文学好坏的重要标准，但也从来不能被绕开。作为一名带着黄河风沙和中原麦苗味道出场后，又执着于刻写沂蒙山地村庄、人物、林木、虫鸟气息的县域写作者，回顾二十五年来我走过的那一串文学脚印，忍不住感叹“真不容易”且“写得不少”，但继而又会自惭形秽且倍感沮丧。同龄写作者甚至更年轻者已经写出了自己的“约克纳帕塔法县”，像徐则臣的“花街”、班宇的“东北乡”、魏思孝的“辛留村”和刘星元的“年轮小城”，而我还在群山里翘翘超超，寻找上山的小径。

但我知道，这条羊肠路上，不仅有我，还有许多同行的人。作为城乡接合部的县城，在中国拥有庞大的数量且特殊的地位。空间上，它是连接乡村与城市的纽带和场域；时间上，它既是千万年时间长河坐标上的“不变原点”，又在乡土剧烈嬗变中成为粗糙、野性和潮流杂糅的集市。这里有那些从土地上走来的劳动者，那些哺育优秀大学生的传统家庭，那些走向世界的前沿科学、艺术门类的人才……走进县城，热气腾腾的生活扑面而来，鸡飞狗跳、家长里短的喧嚣一刻不停，这就是我们的“生活现场”。

文学来源于生活。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、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、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……热腾腾的生活场景摆在那里，形形色色的人川流不息。这里既有我们的“父母与故乡”，又有我们的“奋斗与未来”，这正是大众文学的“根部”和“源头”。从几千年前诗经《国风》里的吟唱，到诗词歌赋里的“茅店月”“板桥霜”，再到鲁迅的“未庄”与“鲁镇”，这些故事都发生在县域乡村里面。

但是在一段时期内，这一片巨大的“题材场”空间作

回到文学本身

□吉小吉

品乏善可陈，甚至有人提出这种题材已经过时，不会再拥有读者。可数以亿万计的“县乡人”火热的生命不应该被文学无视或忽略，它是今天中国巨大的发展空间所在，也应该是文学和其他艺术门类认真表达的阵地。事实证明，县域写作者一直非常勤勉且努力地书写着。据笔者目力所及，几乎所有县城都有作家协会和一群默默耕耘、笔耕不辍的写作者，这个队伍非常庞大。仅就笔者所在的沂蒙山腹地蒙阴县而言，全县不足50万人口，县作家协会会员达130多人，省级以上作家协会会员20余人，每年创作量高达几百万字，发表量也近百万字。除此之外，新大众文艺创作群体数量庞大，柳琴剧团、庄户剧团和县文化馆小戏小剧演员近百人，网络作家、素人写作者如“沂蒙二姐”也有不少，他们都有不俗的表现。

在沸腾的生活中，拿起手中的笔，书写身边的人和事——县域生活是一片写作的富矿。2019年10月的一天，我和朋友进山，登上曾拍过电影《高山下的花环》的安平山，举目四望。沂蒙山区群山连绵，脚下板岩砾得脚板生疼，山顶上一片荒芜，可就在岩石缝里，我突然看见了一朵小花。几乎没有叶片，根部不见土壤，一朵红花就那样惊艳地在石板缝隙里绽放出来，让人震撼。一瞬间，沂蒙山百年的革命历史，那些前赴后继的支前劳力、吱吱响的木轮小推车都浮现在眼前。再看看今天那些倔强而朴实的劳动者，他们与这朵小花又何其相似？他们坚韧、质朴、明媚，让人心动。回来后，我写出了26万字的反映沂蒙巨变的小说《蝴蝶谷》。最近几年，这个县被评选为全国“两山”实践创新基地、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，每年有70万亩桃花在春天盛开，10万亩的云蒙湖也

恢复了良好生态，成为鸟类的天堂。这些都给了我丰沛的灵感，由此创作了长篇散文《湖边书》。随着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，城市文学作品也越来越多、越来越精致。但现代人重复单调的生活模式，也带来文学题材和文笔的同质化。新鲜的、时时变动着的县城生活和人事，以及那些越来越美的生态故事，热切等待着写作者用眼睛去发现、用笔去记录、用心去表达。张楚《云落》、朱山坡《蛋镇诗社》、周荣池《父恩》等作品为我们奉献了县城经验和日常的烟火，但毋庸讳言，县域文学还远远不够。县域文学资源的富矿摆在那里，前来淘金的人很多，但是能挖出金子的人还太少。众多素人写作者，“钻头”还不够锋利，无法深入矿底，探寻出更多的黄金。文学不是照搬生活，县域写作者普遍存在视野不够开阔、眼力不够敏锐、笔力不够深刻的问题，写作的元气、中气、悍气不足，呈现纤弱状态。更不用说，面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，有些写作者眼眼花缭乱，抽丝剥茧、去伪存真的能力还有不足。点灯熬油写出来并发表在县市级报纸副刊上的多为千字文，有生活的野生气、人间的烟火气，但还缺乏更高层次的文学性、思想性、哲学性、批判性。只有穿透生活的表面，捕捉到属于文学的“诗意”和“真实”，才有可能写出好的文学作品。

那么，县域文学如何走出县城这个“圈圈”？我坚定地认为，重要的路径是“回到文学本身”。

一是要立足县域特质，建立起地方性独特书写，切入更大层圈乃至世界性的窗口门户。要从区域内不同于别的地方的一切事物来确立自我，要有坚信“地方的，也是世界的”之文学自信，敢于亮出自己县的不同寻常。以我熟悉的桂东南小城北流为例。梁晓阳《凤凰单车大链饼》（《广州文艺》2024年第1期）正是这样一篇充满自信的小说。小说以大量的当地方言，还原桂东南乡村的对话场景与思维逻辑，深具地域真实感。鲜活的人物、精巧的结构和深沉的意蕴，成功描绘了一个特定地域的生动图景，记录了一代人的情感与命运，并折射出中国乡村在时代巨变中的深刻变迁。

二是要立足生活实践，建立起以柴米油盐的日常唤醒身体里的文学审美并自觉对话的机制。要做时代的在场者，深入挖掘独特的经历体验，写出生活的沉淀，写出生命的体悟。北流诗人安乔子就是如此，诗人林莽曾这样评价道：“安乔子的诗取材于乡镇生活中真切的生活和感受，她以质朴的语言、细微的观察、准确的表达，体现了写作能力……”广西兴业县的温雄珍15岁进入社会打工，生活坎坷，但诗之光让她在生活中得到了精神的升华。她说：“我只想遵从自己的内心，用自己的方式，写自己想写的东西。”

三是要立足文学本质，建立起不断自我审视和不断自我更新的认知视域。北流诗人谢夷珊是践行者之一。从关注本土到关注世界，他的认知视域不断拓展。他写广西以南的大海、岛屿以至南洋的诗集《兰卡威一日》，获得第十一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，这是对他基于文学本质的广阔认知视域的充分肯定。

当然，县域文学需要地方各种扶持措施去推动其繁荣发展。一个地方对文学事业的重视程度，一定会直接影响到县域文学和基层写作的整体态势。我觉得，重点讨论和研究建立鼓励县域文学和基层作者创新创作机制，是很有必要的。县域、乡镇、村屯不能因其小或偏僻而被遗忘，反而应是鼓励政策的重点实施之地，身在县域、乡镇、村屯的文学创作者理应受到更多阳光的普照。因此，地方上应从行政管理服务的层面上，给予县域文学和基层作者更多政策上的鼓励和关怀，出台倾向性鲜明的物质奖励措施，改善基层作者的创作环境，促进县域文学因地制宜、各彰其异，推动形成文学的整体繁荣发展局面。

近来“文学‘县’场”活动声势浩大，加之在“新东北”“新南方”等地方性写作讨论浪潮的裹挟下，县域文学也成了热议的话题。如何看待县域文学的现象？我觉得首先应该跳出“城乡二元对立”的固化思维。“粗糙”与否，是不是“原生态”的“初级素材”，需要就具体作者和具体文本去讨论，并不能成为县域文学和基层写作的标签。毕竟许多城市书写，同样存在“粗糙”和“初级素材”等问题，并不因作者身在城市，书写就必然“精致”。

相对于大城市，县城和基层乡镇处于较偏僻边缘的位置是毋庸置疑的。这也是直接造成基层写作者产生各种困惑、遭遇各种困境的主要原因。

一方面是因为文学外部的困境。首先是生活重压与文学书写的冲突。各种资源相对稀缺和经济条件相对落后，致使写作者学习和自我更新的契机匮乏。加上常因柴米油盐而奔忙于各种活计当中，创作时间少，甚至中断写作。这就造成了作者文学观念陈旧，作品量少且质量不高：不是文字流畅度差，就是文本连贯性不强。反过来，创作成果的成色又严重影响着基层写作者的信心。其次是县城文人心态与文本“突围”的冲突。基层作者因取得了一定成绩，极易自我满足、不思进取。作品的影响力因此总在“圈圈”范围内无法突围，但是又强烈渴望被更大的世界认可。

另一方面，则是因为文学内部的困惑。有些作者文